



吴相湘文集

吴相湘
著

現代史事論述



吳相湘文集

現代史事論述

吳相湘著



中國史資料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史事论述 / 吴相湘著 . — 2 版 . — 北京 : 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16.1

ISBN 978-7-5000-9728-0

I. ①现…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IV. ① K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734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郭银星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969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2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728-0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
国父生平最早政论	33
国父为什么上书李鸿章	41
“孙先生曾见过李鸿章”系属无稽之谈	51
关于中山先生与李鸿章见面问题	54
国父与日本关系	56
国父联系北洋皖奉各系的一些史料 ——国父致吴忠信及段祺瑞与张作霖函原迹暨吴忠信跋文	70
国父论革命的意义	96
“孙文策略”被曲解了 ——国父广州蒙难后严正声明	108
武昌首义第一枪及其他	117
辛亥阳夏之战的重要性	123
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生平事迹	135
赛珍珠看抗战时中美关系 ——为抗战胜利受降 35 周年作	152

抗战时外交活动一页	
——颜惠庆使美文电摘要	161
抗战史实 永志不忘	170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日本窜改教科书的对策	174
北伐誓师 60 周年	179
80 年前国人对西医的观感	
——美国胡美医士的亲身经历	202
大江会与国家主义	217
杨宇霆之死不是端纳告密	227
教育家陈润霖先生传略	234
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运动	
——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序	246
从定县经验谈台湾基层建设	252
马神庙·译学馆·汉花园	
——北京大学忆往	259
胡蝶和她的时代	271
刘廷芳的“内幕”订正	280
有关卿云歌三种权威性的资料	288
《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影印本) 前言	290
《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影印本) 前言	
——《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	298
《鲁案善后月报特刊——铁路》(影印本) 前言	
——《民国史料丛刊》第十七种	303
《农业论文索引》(影印本) 前言	
——《民国史料丛刊》第八种	306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提要

孙逸仙先生诞生、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中国对日抗战胜利40年，三件划时代大事，先后出现。时势趋向，前者及于后者影响，值得注意。

19世纪以来，全球大势剧烈变化。中国为求独立、平等、自由，必须迈向现代化大道。因此，她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现代文化、思想、知识、行进才能适应世界现实。孙先生出生于贫苦农家，自幼上山捡柴下田插秧，养成努力奋斗以求生存生活习惯；青少年时接受现代科学教育之外，又曾研读中国古书。这些优良条件，是同时人如李鸿章、康有为等所缺少。故曰：孙先生诞生是中华民族大幸。

自1890年“孙文策略”，至1894年上李鸿章书，是孙先生提出救国图存的和平方案。逮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又告失利，孙先生才不得不改用强迫手段，联络秘密会党如洪门、天地会为武装起义的主力。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目标，或曰救国方案的纲领，是采撷中国固有文化、思想，与世界新知

识，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而成。

洪门、天地会，久为民族革命集团。这些秘密会党最早组成分子，是台湾延平郡王郑成功旧部的后裔，以征讨占据黑龙江畔的罗刹（俄罗斯）人，全胜而回的光荣战迹，为创会团结的根苗。近年自海内外发现的《秘密会社史料》、《天地会文献录》，与清代官书相互比勘，证明其所传不虚。

孙先生故乡及求学时期友好，与秘密会党都有渊源或关系，故能联络作十次武装起义的主力。

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是中国革命史新纪元。孙先生原经倡导的四大纲领依旧，知识分子尤其留学生作革命领导，秘密会党分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是革命策略一大改变，中华民国得以迅速肇建，可见其成效。

中国同盟会仍旧是秘密活动团体，是一新创的组织，是集合全国精英而成。孙先生被选为总理，主持领导，是众望所归的自然形势。

1897年以还，孙先生开始结识日本民间人。但这些民间人于中国革命运动，都各怀自私自利企图，只有宫崎寅藏一人始终为中国革命而尽瘁。

1923年、1924年，孙先生曾经多次手书或口讲，忠告日本朝野：不要为列强做嫁衣，反对中国革命，今后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或为西洋霸道文化的鹰犬，日本朝野应冷静思量。1934年，胡适撰文更坦率说：现在不要再谈“中日亲善”，而是如何解消中日仇恨的时候。惜忠言逆耳，日本军阀终闯出大祸。对中国广土众民、民族意识高昂等等，全不顾及。无知、无谋、无策，以致无条件投降。

中国长期抗战获致胜利的历史意义，值得研讨。

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发现许多问题，今只提出三端研讨：

《水浒传》、《彭公案》等久已流传民间小说，其影响舆情早经专家指陈。近 50 年史实，更足以证明。惜文人学士多不屑一顾小说。即对于由小说改演的戏剧、电影，亦不例外。

苏联及日本，多年来于中国现代有关史实，多加歪曲改窜。“历史镜子”尘埃污沾，如何使其光明，应为中外同道冷静考虑一问题。

海内外存藏中国现代史料仍多未见有效运用，尤以现在鲲岛学人限于环境，遂致原应居优势地位者反处劣势。今日必须力图补救，化劣势为优势，应迅速实现下述建议：

(一) 考选各大学研究所毕业青年前往海外研究，扩大其心胸、见闻、学识，经时三五年，当有专门著述问世。人才由鼓励，即各大学优秀学生亦必纷纷献身于这一领域。(二) “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时，海外院士一致签名要求开放大陆资料进口，应已实现。久存台湾的大陆早期有关史料，亦应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先例，集中一处插架陈列，供资深研究人员应用。这比较山崖石穴访散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艰巨历程，难易显而易见。总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一切问题的大前提。

二、正文

孙逸仙先生诞生、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中国对日长期抗战胜利，是中国现代历史划时代大事，更是华夏统一建国 2300 余年空前大转变的开始。三件大事，各相距 40 年发生，自是偶然巧合。但时势所趋、先后的影响，值得注意。

孙先生诞生之年，在西欧工业革命促进世界局势激变以后，欧美人如马克思暨亨利·乔治等都在注意或讨论资本生产过程、

工业进步后贫富悬殊，以及私有土地制的不公平现象。同时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国会通过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Bill）；普鲁士征服奥地利；西伯利亚地区被俄国奴役的波兰亡国之民宁死不屈奋起反抗。中国经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建立福州船厂，自造兵轮；中国与英法缔结移民条约，保障被招募前往南洋群岛的中国劳工利益。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最后根据地——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县）——失守。捻军势力扩大，分为东西两股发展；中国域内不堪异族专制压迫的人民此起彼落反抗清廷。

孙先生出生地是现代中西文化接触焦点，也是华夏民族意识蕴蓄强烈的一所在。

时代背景与人文地理环境如此，加以孙先生诞生于世代贫苦农家——农业家庭为求生存、生活必须努力奋斗，在思想上更是单纯净素，虽免不了几千年来传统的习俗，所受名教思想的束缚却甚浅。

尤其孙先生少年时所受教育是西洋的新式教育，以科学为基础，而且是长期的观察与研习的训练；故对于西洋情形及现代文化与思想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中华民族一大幸事：因为中国既只能从现代化寻找出路，其领袖人物自应对现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

孙先生受过长期科学教育，故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他人所提出方案，并且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或许有人初闻其议论的仿佛觉得谬妄胆大，然实际是切合的^[1]。并且高瞻远瞩、顾及将来的一切变化。

孙先生早在檀香山求学于西校时，即曾利用晚间随杜南（1854—1939）先生肄习中国书籍。19岁在香港，停习英文，后

治中国经史之学，独好三代两汉之文。而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不故步自封，更注意时代新知：初嗜英人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 1809 - 1882）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说，复阅俄人克罗泡特金著《互助论》（Kropotkin, Peter [1842 - 1921]: On Aids），即从善如流。如孙先生自述：“我进行中国革命运动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有些是因袭中国固有的思想，有些是规抚欧洲的学说事迹，有些是我独创的”。

民族意识蕴蓄深厚

孙先生原有意学海军。1884—1885年，中法战争，福州马尾船厂及自造兵轮，几全被毁，孙先生深受刺激；幸香港华工所表现的同仇敌忾不惜牺牲的爱国行动，给予莫大启示与勇气。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国新式海军又告失利。孙先生闻讯恍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因即前往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主持广州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是当时的环境适合于康有为，不适合于孙先生。孙先生要领导活动，除了秘密会党以外，没有几个人肯受他的领导；康有为要领导活动，肯受他的领导的人却很多；如孙在檀香山发起兴中会的时候，所得的同志，不过他的胞兄德彰和邓荫南等20余人；康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就有一千二三百人。第一次起义在广州失败之后，国内人士因此有知道孙文名字的，但是报纸上讲到孙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点水作“汶”，形容他与强盗乱贼一样。孙先生再往檀香山、美洲和英国各埠去推广兴中会；欢迎革命主义的，每埠不过三数人或十余人。在与西人接触的国外尚且如此，国内更不待言^[2]。

吴敬恒自述有云：1898年，即听到孙文姓名，认为他不过如

江洋大盗一流人物。1900年，惠州之役以后，对孙的印象由洪秀全第二升到刘秀、邓禹型式。但1902年吴在日本仍不愿随钮永建同往一见孙先生：“就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3]。

1905年1月初，孙先生自美国到达伦敦后前往拜访，吴敬恒的观感已随时势而改变。

1905年5月，中国留欧学生集会邀请孙先生出席时，孙仍相信借秘密会党起义；而留欧学生不以为然。经过三昼夜讨论，孙先生才开始同意这些学生的若干见解，即席表示：“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意仍在运动会党作主力^[4]。

孙先生自撰《革命之主义》中有云：“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光大之”。《建国方略》中“有志竟成”章及民族主义讲演中，孙先生又再三说明：这保存遗留民族思想的先民，就是300余年一个民族革命的集团，其名称就是具一贯传统的“洪门”或“天地会”。

30余年来，国内出版得自伦敦博物院及广西贵县、广东守先阁收藏的洪门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海内外旧抄本不约而同的一主要点，即指明洪门或天地会组会的缘起：“道袍血染泪痕飘，事因西鲁起根苗”；都以《西鲁叙事》或《西鲁序》为洪门创立的最早渊源。并且300余年来，洪门开山集会仍以“打木杨城”（拜斗）为不可或缺的大礼，尤其特殊纪念意义。

《西鲁叙事》或《西鲁序》以征讨西鲁为根据，全文恍如行伍中人远征归来娓娓陈述随军冒险战斗经过。今就中国学人研究这些资料的结论：（一）《西鲁序》中所谓西鲁事，即指西历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征讨侵略中国黑龙江的俄罗斯。（二）清代人称俄罗斯作“罗刹”，而这“罗刹国在极西绝荒远”，故一般人称作西鲁。这与世人后来称“北美”、“西欧”，日本人称“露西亚”意同。（三）攻击黑龙江畔雅克萨城的先锋队：台湾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旧部藤牌兵500人，他们在摧毁雅克萨城、凯旋回北京后，不受满清官职或封赏，其中128人旋往法兴寺出家修行。礼佛诵经之余，好拳术。后被清吏暗杀。法兴寺改名少林寺。一般人竟以少林寺僧相称而忘其原名。（四）侵踞中国黑龙江畔、筑城备战的俄罗斯人，就地取材，“栅木为城”，500藤牌兵前进时，“众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扁刀以迎战”，遂使罗刹人“火器无所施”，并被杀伤大半，最后只有投降，而藤牌兵“未尝亡一夫于敌”。

这一辉煌胜利，遏阻俄人多年来东进侵占中国领土、轻侮中国实力的言行，且被迫北走或西退。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订立。从此，保障中国东北疆域约150年的和平安宁。

少林寺僧虽被杀害，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却已经被清廷分别安置于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地方的郑氏旧部口耳相传流播。这批人的家族后裔为纪念先人，因秘密结党立社相互团结以求生活。

相传郑氏嗣王的军师陈永华曾撰有《海底》一册，不存于世。上述30余年前刊行的三种史料，原绝少公开传布。天地会众弟兄们只有秘密口耳相传，最初，利用久已通行民间的《水浒传》沟通一切。

这一著名小说内容，处处要杀尽酷吏赃官，反对黑暗政治。这正是专制王朝，尤其清嘉庆帝（1796—1820）谕旨中的“官逼民反”情势下，中国各地民变层出不已的必然反应。道光朝

(1821—1850) 鸦片祸毒更深，不仅将无可可用之兵，且将无可筹之饷，民穷财尽情状益甚。洪秀全的太平军开始起义。1851年即清咸丰元年，清廷发现《水浒传》所产生的作用，明谕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但《水浒传》流播的种子已难扑灭，不久，《彭公案》代兴，以征讨俄罗斯获胜的主帅彭春、清正廉明好官彭鹏两人的事迹，糅合为一而作主角^[5]。这既承袭洪门传统，更显示当时人民企盼打击侵略者和廉洁政治的心理。

民族意识即古代夷与夏的观念。公羊成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并不是尊己而轻侮人，是内外亲疏情感的自然反应；不独夏对夷如此，夷对夏也是一样。这种民族意识在国家承平及统一时不甚鲜明；当国土被侵袭或分割时，这种民族意识特别显著^[6]。

1851年时，中国已陷于帝国主义国家海陆夹击的钳形攻势中，并且这一铁钳逐渐夹紧：1895年以来，赔款割地、内地设工厂、东三省境建筑铁道、沿海港湾租借等等，局势更加严重。而慈禧无知自私竟利用义和团作政争工具并且排外，以致40年间，北京两度被洋兵占据。清廷又将庚子赔款交由各省县摊派，疆吏借机浮收自肥。人民纷起反抗，“官逼民反扫清灭洋”旗帜先后出现。各地秘密会党更加活跃。

孙先生的故乡是秘密会党与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心之一，少年时代的良朋大多属会党分子。孙先生的十次革命起义多半是会党领袖所主持，即这十次武装起义以外，尚有多次起义与勇敢的行动也是秘密会党所经营。辛亥（1911年）以前，会党领袖曾组织各种团体促成革命。即辛亥年“三二九之役”（1911年4月27日）与武昌首义的经费大半是秘密会党捐助，新军的运动也多由会党分子作媒介^[7]。

这一具有多年光荣传统的民族革命集团，对于革命的贡献如此。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仍借会党分子作起义的主力，知识分子为领导。中华民国的肇建，是这两大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奋斗。

中国革命史新纪元

1900年，中国命运面临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未即施行瓜分，却开始蚕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种种侵略的步伐加紧，中国已沦为次殖民地。有志人士逐渐醒悟。

1903—1905年间，留日留欧学生日多，思想进步。国内各界也因各种革命书报影响，波涛汹涌。阻法、仇俄、抗美等民间运动，相继发生，显现国人民族自尊心强烈，增加排满力量。

当时，留日学生刊物，如《浙江潮》首先发出“非省界”社论，主张消除地域观念，联合建立统一团体：但有国界不有省界；拔留日学生各省同乡会精华而建为中国本部统一会。《湖北学生界》立即响应，改名“汉声”。而留日归国学生邹容撰文刊载上海《苏报》，鼓吹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为一绝大合法团体。事实上，上海已有中国教学同盟会出现。陈天华撰刊的《猛回头》宣传册提出当前十要的第一要，即“除党见”，同心同德：“只要这真守旧真求新的会联合起来，这利益就很大了。从前只有守旧、求新二党。到了晚近，即求新一党又分出许多党来，有主张革命的；有主张勤王的；有主张急进的；有主张和平的；有主张陆军的；有主张科学的；比那从前两大党的竞争，还激烈一些。不晓得都没有平心去想。此外又有私立的党会，算起来不下数千百起，都不相联络，此处起事，彼处旁观，甚或彼此相仇，也是有的”。于各种团体分立甚或对立的弊害辟析入微而动人。

先是：1902年春，留日学生秦力山（祖籍江苏吴县，出生于湖南长沙）、程家桢首开风气，自东京往横滨访晤孙先生，改变若干人对孙“骁桀难近”的视听观感。自负甚高的浙江名儒章炳麟与孙先生聚谈，也有“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唐）才常辈也”的深刻印象。1903年，上海刊印章士钊《大革命家孙逸仙》（自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内容述及1897年以至1900年，孙先生革命起义的有关言行。其中再三言：谈兴中国者不可不有孙逸仙，有孙逸仙，中国始有可为。

上述种种事实，是1905年间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有利的因素，也是当年夏孙先生自欧东归时美丽动人的背景。正如孙先生在途中寄信初次晤谈的南洋华侨新加坡报人陈楚楠（Tan Chho-lam, 1884 - 1971）手翰所谓：“时机已熟。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

是年7月19日，孙先生到达日本东京，即经宫崎寅藏介识湖南华兴会领导人黄兴，两人一见如故，恳谈组织革命大同盟事。旋又得晤湖南宋教仁、陈天华，谈论联结人才为今后革命方法，不可各省各自起事，必须相互号召，方可避免外国干涉。7月30日，孙先生与原属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及留日学生团体中部分人员集议，讨论结会具体办法。8月13日，留日学生1200余人聚会热烈欢迎孙先生。于是水到渠成。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通过组织章程，选举孙先生为总理。

如陈天华所记述：“孙君为一造时势之英雄。吾以崇拜民族之故，因而崇拜实行民族主义之孙君。”“况孙君于十余年之前，民智蒙昧之世，已能见及此而实行之，得不谓为间世之豪杰乎”^[8]。足以代表当时青年心声。群星拱月、众望所归的趋势如此。加以孙先生对现代文化思想的认识远在同时任何一人之上！

孙先生手撰《有志竟成》自传（《孙文学说》之一章）有云：“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万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进取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则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自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之革命同盟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事实上，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不过六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目标就已达到。

中国同盟会能顺利组织成立，程家桢实是关键人物。他早在1902年即因旅日香山县华侨三合会会员郑可平之介，往横滨拜晤孙先生，孙为程言民族民权民生道理，五权分立暨以铁道建国大道。程深切感佩，“请毕生以事斯语”。欲树党全国以广传播。但孙先生意惟欲东京留学生中联属20人：以陆军十人率两粤三合会、长江哥老会为起义之师；以法政十人于占据城池后，整理地方及与外人交涉。程却嫌人太少——1905年夏，孙先生自欧洲到日本之初，仍持1902年对程家桢所言“联属二十人”原计，与少数留日学生争论不决。程乃力陈三年来形势演变，已自开山引泉，达于大川；今昔不同，勿再提旧议。留学生欢迎会中，程致辞更强调：“必须联合留学生，归国之后，于全国秘密会党有以操纵之。义旗一举，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垂手而摧清廷。若兵连祸结，则外人商业必受损害。而戎马倥偬，军士非尽受教育，则焚教堂杀外人所不能免矣。外交牵涉，国难骤起。今留学

既众，曷若设革命本部于东京，而设分部于国内通商各口岸，他日在东京留学毕业而归，遍于 22 省，则支部之设，可以不谋而成。”出席人众 1200 余，皆大鼓掌，声震屋瓦。孙先生大悦。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举行时，出席 100 余人，比较二旬以前参加筹备会当场写盟书的 70 余人稍多。其中自有新人，不免对孙先生言行仍未甚知晓。故当大会进行演说时突有人起立询问孙先生：“他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抑为民主？”程家桢立即越席发言：革命是全国大家的事，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若我们心胸中没有欣慕“从龙”的，则君主无从发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是否应当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或民主。

因此，当时参加这一成立会的张继一再强调指陈：程家桢之于中国同盟会，而能全举其纲。所谓能决胜于帷幄者，非欤。向使留学界而无程家桢，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9]。

中国同盟会的性质，由其名称即已充分表达。因同盟一词早已见于《左传》、《孟子》。意即宗旨相同利害与共的若干国家或团体相互联合，个别国家或团体仍具独立性，并非融合成一体。就它的正式英文译名，见诸 1907 年孙先生委任宫崎寅藏为全权代表的文凭上钤中英文圆形印章，外圈英文 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内圈右为中国、中为同盟会、左为印章二字（见《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篇首图片）。联合意义尤见显明。且《同盟会总章》第五条：“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但各缴入会捐一元，一律发给会员凭证。”可知这是一全国有志革命分子为从事革命运动联合而成的一革命团体^[10]。

邹鲁撰《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页开宗明义指陈：“自同盟会至中国国民党，每易名称，均有正式宣布。而兴中会与同盟会